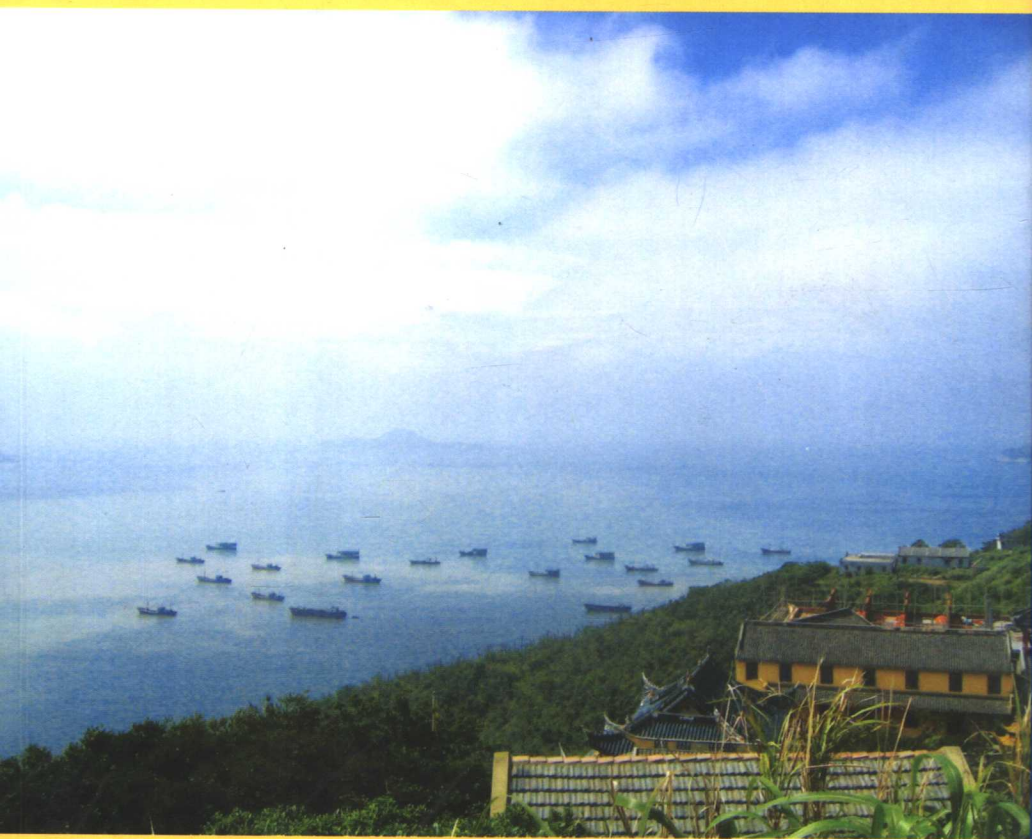


中国渔业经济与管理研究论丛

上海现代渔村社会经济发展史研究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Socioeconomic History of Shanghai Fishery Village

韩兴勇 著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中国渔业经济与管理研究论丛》

上海现代渔村社会经济发展史研究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Socioeconomic History
of Shanghai Fishery Village

韩兴勇 著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现代渔村社会经济发展史研究/韩兴勇著. — 上海: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2006. 8
(中国渔业经济与管理研究论丛)
ISBN 7-5427-2109-7

I. 上... II. 韩... III. 渔民 — 乡村 — 社会发展史 —
研究 — 上海市
IV. F326. 47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33406号

责任编辑 陈爱梅

上海现代渔村社会经济发展史研究

韩兴勇 著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832号 邮政编码 200070)

<http://www.pspsh.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 889X1194 1/32 印张 7.25 字数 208000

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27-2109-7/F·110 定价: 138.00元 (共四册)

总 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渔业经济快速发展，渔业在大农业中的地位逐步提高。渔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1978 年为 1.6%，1992 年为 6.8%，2003 年进一步上升到 10.6%。同时，我国渔业在世界渔业中地位也迅速上升，在世界的排位从 1978 年的第 4 位逐年前移，1989 年起至今，总产量一直居世界首位。2003 年总产量达 4706 万吨，约占全球渔业产品总量的三分之一。我国渔业人口为 2070 万人，仅占我国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二，但却为我国人民提供了动物性蛋白质的三分之一。

显然，渔业经济发展的成果值得国人骄傲和自豪。但是在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我国渔业经济的迅速发展是有代价的，渔业经济发展中还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渔业资源的持续衰退与渔业环境恶化问题。无论是来自近海还是内陆湖泊的调查都显示，我国渔业捕捞强度过大，养殖渔业环境问题突出，“公地的悲剧”屡屡在渔业资源开发利用中上演，导致了我国渔业资源衰竭，水产品质量下降，对我国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二是海洋渔业中的组织资源和制度资源短缺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海洋渔业经济管理的方式逐渐从计划管理转化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管理。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的过程中，组织资源和制度资源的短缺使得海洋渔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序化状态。在实行“双控”的同时，渔船数量和马力曾持续增长等现实表明，管理者当局在局部上对渔业生产者的管理是失效的。可以说，组织和制度资源的短缺已经成为阻碍我国渔业经济持续发展的又一大障碍。

三是我国与周边有关国家由海域管辖权争端引起的渔业资源开发

利用问题。随着两百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实施和资源的日益短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海域管辖权问题也日益突出。有些国家为了争夺资源而对本来属于中国的海域声称具有管辖权，并屡次扣押中国渔船，严重威胁了我国国家主权、渔民的安全以及渔业经济的稳定发展。

四是渔业经济发展的同时，渔民收入增长幅度放缓的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渔民收入增幅曾一度达到30%，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渔民收入增长幅度逐渐下降。从1993年的32.9%下降到2002年的1.5%，近两年虽有所回升，但增幅很小。如何让渔民充分享改革所带来的成果，提高其福利？对此不能不认真地思考和深入地研究。

除此之外，渔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尚存在渔业税费改革、海洋捕捞渔民的转产转业、提高渔业科技贡献率、渔业生产安全、水产品质量安全、水产品贸易摩擦等等问题。

世界是矛盾的世界。在渔业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总会出现。既然要改革，我们就必须有勇气去面对新的矛盾，必须勇于去解决新问题。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上海水产大学经贸学院的几位青年教师敢于挑战这些关乎我国渔业经济健康发展的新问题，分别以《捕捞限额制度研究》、《海洋渔业资源管理中ITQ制度交易成本研究》、《中国海洋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组织制度》、《上海现代渔村社会发展史研究》为题目，围绕渔业资源管理、渔业制度建设、渔业权争端、渔村社会发展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得出了一些颇具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结论。尽管许多方面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但我相信该丛书的出版定能够为我国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顾焕章

2006年7月于南京

前 言

中国是世界渔业大国，水产品总量连续十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位，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机动渔船和渔业劳动力。但近年来，随着传统经济鱼类资源普遍衰退以及新国际海洋制度的形成，我国捕捞努力量相对过剩，作业渔场面积缩小，渔业经济效益下降，对我国渔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和渔区的社会稳定。我校四位老师分别将这些问题作为研究内容，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独特的、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见解。

在《中国海洋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组织制度》中，高健博士围绕“中国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制度设置应该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实行政府管理+市场调节，推动渔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或提高渔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功能是实现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的中心命题，从公共地悲剧及其理论、公共池塘资源与外部性市场失灵、公共池塘资源与公共物品的市场失灵和渔业管理的政府失效理论，分析了渔业资源容易过度利用的经济学原因；同时，从制度经济学与组织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我国海洋渔业经济增长的源泉，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建立合作经济组织的必要性。最后，研究分析我国海洋渔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功能、实现渔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变迁路径、推动渔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变迁的动力和发展渔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政策选择。

在《上海现代渔村社会发展史研究》中，韩兴勇博士以上海的渔村经济及渔业生产生活的历史作为对象，研究和总结上海现代渔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过程。其研究对补充和完善上海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过程是很必要的，同时也能反映中国现代渔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就上海地区而言，渔业经济在整个产业结构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它作为社会组成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人类的发展史中，

渔业始终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因而它将在社会文明史中占有永久的一席之地。通过研究渔业社会经济发展史，能让我们看到社会发展的演变历史。作为基础研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将为我们把握今后的发展方向作重要的参考。

在《论个体可转让配额制度的交易成本》中，杨正勇博士就渔业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对个体可转让配额制度的效率的影响进行研究。中国，其自身文化和社会特色、从事捕捞业的渔民过多以及捕捞业的兼捕等，是导致渔业经济活动和渔业资源管理中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原因。实施该个体可转让配额制度，必须努力降低该制度的交易成本，如减少现有捕捞渔民的数量，或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提高声誉效应对渔民的约束，通过配额协作团队来增强遵守制度的积极性、降低兼捕渔业中渔民遵守制度的难度。为此，他提出了成立地方性渔民合作组织、通过合作组织加强渔民和渔村自治的管理思路。

在《捕捞限额制度研究》中，唐建业博士主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规定的捕捞限额制度从法律和制度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根据国内外政府改革和国际渔业管理发展的趋势，对渔业管理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在此基础上，运用管理决策、新制度经济学、法学等理论知识，分析捕捞限额制度的理论框架，并结合我国渔业实际情况，提出捕捞限额制度在我国实施的设想，具有可操作性，可为我国政府渔业部门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中国渔业经济与管理研究论丛》是我国较早针对渔业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一套丛书，它的出版可以为我国渔业政府部门的管理决策提供理论咨询，进一步推动渔业研究的发展。

黄硕琳

2006年7月于上海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上海的渔业历史概述	5
第一节 渔业的地域构成	5
第二节 解放前的渔业, 渔民状况	6
第三节 渔业经济的发展和渔村的形成	9
第二章 现代渔村社会的形态和构造	21
第一节 渔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和渔村社会的发展变化	21
第二节 渔村的组织化和行政管理	30
第三节 渔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	40
第四节 渔村和国家社会的关系	48
第三章 渔村经济生产和渔民生产活动	62
第一节 自然捕捞渔业生产状况	62
第二节 渔村的生产管理	76
第三节 捕捞渔业生产的承包责任制	96
第四节 市场经济下的渔业生产资料私有化	102
第四章 各个时期的渔村社会经济和渔民生活	115
第一节 渔村经济收入和支出的诸方面	115
第二节 渔村和渔民的相互关系	138
第三节 渔民的家庭和渔村劳动力变化	162
第四节 渔民家庭收入的差异化	169
第五节 渔村和地域村镇的关系	177

第五章 渔村社会文化和渔民的诸意识	186
第一节 渔业文化的特点	186
第二节 渔村的教育和渔民的教育情况	191
第六章 现代渔村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诸问题	198
第一节 渔业资源保护和渔业经济生产的结构调整	198
第二节 海域使用权和渔业有序发展的问题	206
第三节 渔民的利益保障问题	209
后记	220

引言

渔村社会经济发展史研究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面临辽阔海洋，又拥有众多湖泊江河的国家。在几千年的社会文明发展和经济生活的历史中，渔业经济文化生活一直是很重要的部分。自古以来，我国人民都把和食鱼相关的渔业看作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经济生产活动，由此而产生了渔业经济，生活。我国的文化历史更是源远流长，直至现在我们还常把建设“鱼米之乡”作为一种富有和谐的理想社会目标而提起。因此，和渔业相关连的渔村社会，渔业经济文化便很自然地得到延续。在这个延续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所处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渔村社会也在改变发展，既适应于整个社会又有它自己独特的生活，有着它自己的延续。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的经济文化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社会的结构组成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传统的社会构造和文化传统会逐渐消失和改变，渔业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面临这样的状况，特别是现代，随着政治的变革和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促使这种变化的进程更快地加速，至使几千年如一的传统在现代社会发展的潮流中很快地被冲破，代之以全新的面貌，这样对我们所走过的路程，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和总结就必须及时地系统地回顾，从而完善社会发展过程的研究，体现历史发展的完整。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千百万渔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创造的渔业社会经济文化史也是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应有他们的历史地位，不应忘记他们。渔民，为我们人类提供食物中最鲜美的食鱼在我们的餐桌上给人们留下津津有味食物的群体，他们的生活，他们是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劳作的，这些都是我们应该了解的。虽然我们会认为，渔民只是普通劳动人民中的一个群体阶层。但是渔民是一个以海洋江湖为劳作对象的生活群体，因此，他们和以田地为本的

农民不同。虽然渔民和农民一样，为我们提供食物，但由于渔民依赖生存的对象是海、湖、江、河，这是大自然中最富有生机，而又充满危险的区域，它既能最无尽地为人类提供丰富的物质，又会随时掀开凶暴的一面来危害人类，因此把它作为劳作对象的渔民，生活亦和海洋江湖一样，是不安定的，所以可以这样认为，渔民较之其他劳动阶层的生活要动荡得多，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他们为生活而形成的社会组织——村落，以及创造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也具有自己鲜明地区别于农民的特点，这也是应该成为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原因。

上海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是一个拥有海洋、湖泊、江河的地域，无论是从海洋渔业、海水淡水养殖渔业以及与之相关的渔业商品，还是从流通和水产品加工，消费等渔业经济状况和上海居民的饮食习惯来看，渔业都是不可欠缺的一部分。从上海的社会发展过程看，渔业始终伴随着它的发展，因此以上海的渔业社会状况，渔村经济或渔业生产生活的状况作为研究对象都有其明显的代表性。研究和总结上海现代渔村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过程，对补充完善上海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过程是很必要的，同时，也能反映中国现代渔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过程。

从历史看上海的发展，从原先的一个小渔村到现在的国际化大都市，都十分让人惊叹。尽管渔业经济在现代的上海国民经济中所占比率已变得微不足道，甚至人们在食鱼时都不会联想到渔业以及和它相关的渔村渔民。或许人们有时为把一个城市的过去和现在相比较时扩大其对比性，用以形容两方面的巨大变化与差别。现代化的繁华大上海，几百年前竟是一个小渔村。反过来讲，一个小渔村竟是上海的发展起点，这会让所有想了解它的人产生感叹。所以，本文所要了解研究的问题就是：从小渔村这个与渔村有关的起点，它的自身发展已成什么样了，它的发展过程又是怎样的。虽然渔业在现代上海的发展过程中已不是主线，但毕竟它是一个起点，是任何事物发展都有的一个开始。就上海的地域社会经济构造来讲，上海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社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人群，他们为了生活，不仅融入了上海这个繁荣的社会，而且因为他们本身原来的生活习惯，因为要通过竞争

生存而表现出最优秀的生活技能，使得上海这个地域能够得到飞跃地发展和繁荣。在一个社会构造十分完善的经济中，各行各业的人群都在其特有的谋生方法中展开自己的生活手段，从事渔业的人群也不例外，他们以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都市范围中谋生，既为上海的城市提供美味的食物又发展了自己，而且，在1949年后随着社会的变革，他们也和时代前进的步伐一起，随之变革。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变化，对渔民来讲是前所未有的，从散乱的经营生活到有组织的经营生活，即渔民村落的形成，是上海渔民生活的一个巨大变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渔业社会也同时发展着，而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调整，渔村也同样跟着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而变化着。就上海地区而言，渔业经济在整个产业结构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其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更是微不足道，但无论怎么说，它总是社会组成的一部分，而且人类社会文明史中也有它的一席之地。历史的发展是延续的、全面的，作为渔业以及渔民社会的生活和生产过程，也和历史的发展同步地延续着。但是，在延续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变化，这种变化过程也是历史得以前进的动力。因此，研究渔业社会经济发展史，即所谓的来源和过程是怎么样的，也能让我们看到演变到现在状况，以便我们把握今后发展的方向，这也是本研究课题的一个重要目的。

另外在我国，对渔村和渔民的具体全面的研究还很少，几乎是空白，所以这方面能够参考的研究也不多。上海市的渔业生产量和邻近的江浙两省比较不算高，但上海市渔业种类很齐全，有海洋、长江、河流、湖泊等捕捞渔业，也有海水养殖、淡水养殖渔业，可以说我国的所有渔业种类在上海市都有。而且从事渔业生产的社会构成也是非常完善，有国营、集体、个人渔业之分。因此，研究上海的渔业，可以较全面的了解我国渔业的状况。上海社会科学院在前些年编写的《上海渔业志》是一部记载解放后上海渔业的大事记，比较全面的记述了上海渔业的历史，但是具体地对于渔村和渔民的记述比较少，也缺少对渔村和渔民生产及生活状况的分析，但是其中的很多资料是非

常珍贵的。由于上海地区渔村的变化比较大，现有保存的关于渔村资料又很少，因此，本书的内容主要以解放后（1949年）上海市渔村的经济社会变化为主，在研究中通过对一些渔村和渔民的走访，并参考《上海渔业志》的部分珍贵资料，对上海渔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作一个基本的研究。本文希望能在这方面开个头，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关心研究为我们提供最鲜美食物的渔村和渔民。也正因为这样，本文中的一些论述或观点会有不成熟的地方，希望能得到指正和切磋。

第一章 上海的渔业历史概述

第一节 渔业的地域构成

渔业离不开水域，上海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渔业形式，是因为上海位于我国的长江三角洲，东面面临辽阔的东海，北面紧靠长江，是长江的入海口，南面是杭州湾，西面有天然的淀山湖。沿海有十分广阔的滩涂，境内河湖星罗棋布，无论是海洋和江河湖的水域都非常辽阔，所以水产资源非常丰富，因此上海的郊县都有渔业生产项目。下图为中国东部海区图：



引自《海洋图集》，海洋出版社，中国《海洋图集》编辑部，1993年10月。

在撤县建区以前，上海的郊县渔业因各县所处的地理位置，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渔业生产。崇明县、宝山县、南汇、奉贤、金山县等因

靠近长江入海口或东海、杭州湾，海洋渔业十分发达，是上海传统的海洋渔业地区，还因为这些区域江河纵横，淡水渔业也非常发达，又因为这些区域拥有广阔的滩涂，所以养殖渔业所占比重很大。上海西面的嘉定、青浦、松江和上海县则因湖泊江河众多，主要以淡水渔业为主，其中以青浦县的淡水渔业最为重要。

正因为上海面临海洋，又有辽阔的天然湖泊和众多的江河，使上海的渔业生产具有多样性，从海洋捕捞到淡水捕捞，从海水养殖到淡水养殖，几乎包罗了我国渔业生产的各种形式。另外，由于上海的发展过程中，所居住的人口来自全国各地，对水产品种类的要求也各式各样，这种要求，既符合上海特有的渔业情况，也促进了各类渔业形式的延续发展。

上海渔业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6000多年前^[1]，确实，人类的渔业历史早于农耕的历史，当人类还不会农耕生产时，就在江河湖边靠捕鱼等作为食物来生活。到晋朝，约1700多年前，在今天的上海松江、青浦就有明确的文字记载，记述了当时已有专业的渔民。到了唐朝以后，渔业便已在海上展开，当时上海的崇明岛已初露水面，一些专业渔民已上岛捕捞鱼类谋生了^[2]。以后到近代，渔业逐渐壮大，在上海不仅很多地方有专业渔民靠捕鱼为生，还出现了鱼行，使鱼业的商业性流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节 解放前的渔业及渔民状况

随着近代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的开放，上海成为近代工商业城市，来上海定居的人口迅速增长，且定居的人员多来自江浙一带，素有食鱼的饮食习惯，所以对鱼货的需求也大量增加，上海本地的渔业产量已不能满足需要，大量的水产品要靠外地贩运进上海，因此水产品贸易在上海形成了最早的渔业产业。这些鱼货大量来自于江浙一带，还有从日本进口大量鱼货，水产品贸易的繁荣又促进了买卖鱼货的鱼行大量产生，在上海的十六铺和江浦路沿黄浦江一带，鱼行林立，成为有名的鱼货市场集散地，使上海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水产品集散中心。

民国时期，上海已是全国的鱼货集散地和消费量最大的地区，但当时上海本地的鱼货产量并不高，如民国22年（1933年），交易的水产品已达5.9万吨，本地生产的鱼货仅为3000多吨，所占比例很小^[3]。这是因为当时的渔民以传统的捕捞方法作业，渔具也十分简陋，一条小木船，漂泊江河湖上，以捕捞野生鱼为主，他们没有固定的住处，吃住生活在船上，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这种原始的渔业生活，使渔业长期处于产量低下生产发展缓慢的状态。因此，尽管当时上海地区渔民人数已经很多，但生产力却很低下，在繁荣的上海鱼货市场中能提供的鱼货就很少。

同散乱的渔民生产相比，民国时期，上海的机轮海洋捕捞渔业已有一定的发展，在本地的鱼货产量上占据主要地位，我们现在有据可查的当时鱼货产量，大都为机轮海洋渔业的产量。至于渔民的鱼货产量，由于他们的生产分散，产量低下，往往就地就近采用自由交易的方法，确切的统计就很难把握了。

1949年以前的上海渔民，大都来自江苏。在宝山区（原为宝山县）的长兴乡海星村的调查中得知，这里的渔民都不是原住民，主要来自江苏，原先一直在江苏靖江的长江上捕捞生活，以后逐渐随着捕捞范围的扩大，集中固定在吴淞口外的长江入海口的江面上捕捞，采用的捕捞方法也是传统的作业方式，渔具十分简陋，小木船加上插网，捕捞的经济鱼类主要有凤鲚、刀鲚和前颌间银鱼，还有鲥鱼和河豚等，虾蟹类有安氏白虾、中华绒螯蟹等。由于捕捞作业的范围较以前相对的集中，因此渔民的生活地也较以前集中，虽然渔民们还是主要生活在船上，但已经开始集中在临江的靠近支流河口处，形成了最早的渔民生活集中地^[4]。

在渔民们还未有固定的生活地点，生产也还以分散经营的方式为主之前，渔民们为了生产的需要，有些地方成立了渔会，但这种渔会并不是只由渔民组成，而是渔行和渔民共同参加，是一种松散的生产经营联系形式，渔行中的船主将渔船借给渔民，鱼货按产量分成，一些拥有小木船的渔民则通过渔行将渔货转销，渔行则代为过称，销售，抽取佣金，实权都掌握在鱼行手里。地处杭州湾的金

山嘴，因紧靠东海，历来就是海洋渔业生产的重要地区，在民国时期便产生了渔会，当时广大渔民因生活贫困，自己无力拥有渔船，就分属于多个鱼行的私人船主打工，又由于产量不高，鱼行还要抽取高额佣金，因此渔民的生活十分贫困。有的地方也曾有渔业合作社，如崇明县，因为渔业历史悠久，从1932年开始，便有渔业合作社的出现，但生产经营仍以一船一户为单位，生产规模偏小，经常受渔霸和渔行的剥削，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束缚^[5]。

民国时期的上海渔民虽然还未形成完整的社会组织形态一村落，但他们为了反抗渔霸、鱼行的剥削和苛捐杂税，已经自愿组织起来，进行维护自身利益的抗争行动，据记载在民国19年（1930年），南汇等县千余渔民聚众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渔霸的剥削，渔民们群集县城请愿，要求取消渔头税和小船捐^[6]。虽然最后的结果是渔民的请愿遭到镇压，但渔民们能够团结起来，进行维护自身利益的行动，表明渔民们能够团结斗争要求自己应有的地位，在集中统一行动的意识上有了提高，这种集体思想意识和行动，对渔业的村落组织化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中，一个社会和政治组织（村落）既能够向农民提出要求，也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即能够代表一个群体的利益和要求。另外，在强权的统治下，分散经营的农民在分散的土地上经营相同的产品，他们之间就形不成相互依赖的稳固联盟。同样，由于有地主提供的保护，这些地位相同的农民也就没有互相依赖的必要^[7]。从当时中国农村的渔民的利益上讲，他们虽然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维护自身利益的组织，用来和统治阶级抗争。但是从当时渔民的生产及所处的社会地位来看，由于渔民自身相互间的经济联系十分疏散，使得他们在平时缺乏共同的经济要求，他们的生产和经济在平时只是和渔行发生关系，所生产的水产品也是相同的，产量规模也不相上下，又因为水产品的买卖价格为渔行的控制及渔民自身对生活的要求很底（从生活上有“小富即安”的思想，且往往在渔民之间进行比较），因此，他们很少去考虑共同组织起来形成政治力量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只有被压迫得不能忍受时，才会抗争。这是中国农